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邵力子文集

上册

傅学文编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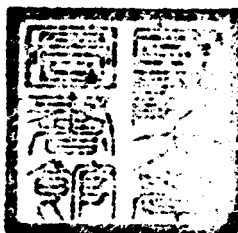


2 020 6895 7

邵力子文集

上册

傅学文编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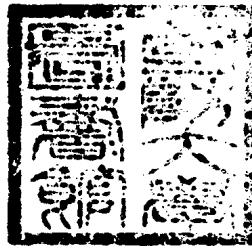


2 020 6897 5

邵力子文集

下 册

傅 学 文 编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吴广义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邵 力 子 文 集

（全 二 册）

傅 学 文 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39.5印张·5插页·874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册

统一书号：11018·1323 定价：7.80元

師 乃子之宗出啟政
 年 亥大子師，
 聲 威震寰宇。
 民 權，民立報，
 文 章嚴鼓舞。
 威 功宏人心，
 乃 子與漁父，
 文 章今同出。
 芳 名留千古

許德珩題詩

(註) 漁父，東宋教仁師名，仲常時嘗
 以漁父之名寫文士事，常在兩報
 發表，又名「桃源漁父」，反二被袁
 世凱暗殺於上海滬寧車站

許德珩 一九三三年
 九月於京

题 词

六十年前我从《民国日报》“觉悟”栏就受到邵力子先生的教益。他毕生对祖国的贡献是和平与统一。和平是成功了，统一还没有实现，但总有一天会到来。我现在引用吾乡爱国诗人陆放翁的名句来纪念我的老友邵力子先生：神州统一团圆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胡愈之

1983.10.14.

一代耆宿 传世文章

——为《邵力子文集》出版而作

屈 武

《邵力子文集》即将出版了。叶剑英同志亲自为文集题签，体现了对邵老的深切怀念。邵夫人傅学文同志嘱我写篇前言，这对我来说，是理应从命的。邵老一生经历了我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亲身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邵老又是我岳父于右任先生数十年深交、彼此推心置腹的知友，也是我一向敬佩的前辈。他对我的关注和教益，使我难以忘怀。在《邵力子文集》即将问世之际，缅怀邵老生平，许多往事萦回脑际，略举数端，藉以表达对邵老的追念之情，也希望能对文集的读者了解邵老的思想、操守和作风多少有所帮助。

邵力子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强烈的爱国思想，是激励和推动邵老前进的精神力量。早在青年时期，邵老目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清王朝的腐败，毅然抛弃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一般封建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和于右任先生创办《神州日报》，从事革命宣传。辛亥革命后，他们又在上海先后创办《民立报》、《民国日报》，进行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五四”运动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我国开始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由于邵老坚持爱国立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他对这一历史性转变采取了积极欢迎的态度，并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当时他所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之一。由于右任先生任校长、邵老副校长的任上海大学，曾经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骨干。邵老还和陈独秀等组织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邵老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支持并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后，邵老虽然在国民党政府继续担任要职，但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的政策，内心是不满的。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加紧对我国的武装侵略，而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更使邵老感到忧虑和痛苦。他同情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赞成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邵老是由衷地高兴的。在抗日战争期间，邵老始终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不论在国内任职或在苏联任大使，他总是为争取抗战胜利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抗战胜利后，邵老曾经担任国民党代表，参加旧政协，对促成政协决议的签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导致国共和谈全面破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大部被歼，国民党政权陷于全民包围之中。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退居幕后。李宗仁代理总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条件，进行和平谈判。邵老再次任国民党代表，同张治中先生等前往北平，参加谈判。在谈判中，邵老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当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以后，邵老对国民党已经完全绝望，首先表示坚决不回南京，留在北平。从此，邵老在共产党领导

下的新中国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愉快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邵老从自己几十年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生前经常以自己终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而感到无比欣慰。他的爱国思想在晚年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深化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真挚感情。邵老的一生表明，凡是真正的爱国者，只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立场，不管经历什么样的迂回曲折，最终是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走向社会主义的。

邵力子先生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邵老主编的《觉悟》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正确主张。北伐战争开始后，邵老作为国民党代表，同当时的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先生前往苏联，参加第三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一九二七年邵老回国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发生。此后邵老多年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但是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特别是国共合作的决策，始终没有忘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邵老是尽了力的。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一再发动反共高潮，企图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邵老对此采取抵制的态度。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邵老折冲樽俎，付出了很大努力。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国共和谈终于失败，邵老感到非常痛心。北平和谈时，邵老力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停战方案，结果也没有如愿。邵老晚年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怀念在台湾的故旧，殷切盼望台湾早日回归，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共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他在世的最后十八年中，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于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老成为国，感人至深。于右任先生于解放前夕被挟持去了台湾，从此两岸阻隔，终老而未能同邵老再见一面。这在邵老是一直深以为憾的。每当看到于先生怀念大陆、抒发悲愤的诗篇，邵老总是抑制不住内

心的激动。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于老怀念祖国故旧的深情，悲伤老大飘零的忧思，情见乎词矣。我知道，这不只是于老个人的伤感，也代表了台湾的许多朋友的心情。”邵老生前虽然不及见到祖国统一的实现，但是今天，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邵老的遗愿终究会变为事实，这一天已在不远了。

邵力子先生为人坦率，性格刚直，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敢于公开自己的立场、观点，置个人利害于不顾。这里，我就回忆所及，举几件事实为例。

一九三八年，邵老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对当时的进步舆论给以同情和保护。由复旦大学主办的《文摘》旬刊，译载了一篇抨击德意日法西斯轴心的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内亲法西斯分子的不满，企图查禁该刊。邵老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质问：我国正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反对同日本勾结的德意建立法西斯轴心，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要查禁？为了这个事件，邵老宁愿辞职不干，始终没有妥协。

邵老任苏联大使期间，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苏联，一度侵占了苏联大片国土。当时国民党内的一些反动分子，幸灾乐祸，认为希特勒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并乘机重弹对日妥协的澜调。邵老回国述职时，在许多场合如实地介绍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事迹，指出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胜利的前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反动分子诬蔑邵老是“苏联大使”，“邵力子斯基”，邵老听一笑置之。为此，国民党政府免去了邵老的驻苏大使职务，邵老毫不介意。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悍然下令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发动全面内战。邵老对此深为不满。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志，邵老拒

绝参加国大的选举。这在当时一般国民党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邵老可贵的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邵老担任了国家重要职务,参与了国家大事,他本着对党对人民的负责精神,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特别是早在一九五四年,邵老就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实行计划生育的建议。他说:“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似乎也应有些限度。”“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等等措施,确是应当传播的;并且,还应当从实际上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方法和物品。”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曾经得到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重视。可惜后来没有坚持贯彻下去,邵老反而受到错误的指责,我国人口也一度无限制地增长,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现在,党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已经进行了拨乱反正,这些年厉行计划生育,收到显著的成效。正反两面的经验证明,邵老的建议是有远见的,是完全正确的。邵老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

至于邵老平素待人诚恳,态度谦虚,好学不倦,生活朴素,这更是熟悉他的同志所深知的,这里就不细述了。总之,邵老作为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

我景仰的邵力子先生

丁 玲

最近读了傅学文同志写的《邵力子生平简史》，重新引起我对邵力子先生的怀念和崇敬。邵先生不愧为我们知识界的先驱和榜样，真正做到了“一生心血为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自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牺牲，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但无数志士仁人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坚持奋发，孜孜不倦，也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我幼年的经历，我特别体会到象邵力子先生这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所给与我的影响。我对他们一直是非常景仰、尊敬，和难忘的。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不满十五岁。我被卷进了这股革命的浪潮。我在长期孤苦伶仃的童年中感受到旧社会、旧时代所加于我的歧视和压迫，使我常常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愁绪。尽管我还很天真、幼稚、简单、无知，也还不善于观察，更谈不到理解，可是“五四”运动突然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在黑暗中发现了一线光明。在湖南桃源女子师范学校，我随着高班的大同学，一同冲出校门，上街游行，大声疾呼，要唤醒民众，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我们成立学生会，与当时学校当局及少数同学辩论，要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我们创办夜校，在工农群众中扫除文盲；为了追求新知识，新理论，我们学生会订购了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许多进步

的报纸杂志，如《新潮》、《民国日报》等。我就是在这时开始读报，开始知道了那些作者，其中就有邵力子先生。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是生疏的遥远的智者、大人物，却又都是亲近的老师般的知心朋友。

这年下半年，我转入长沙的周南女校。我的语文老师陈启明先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每天都把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用红笔画出来叫我们同学们读。他圈选得最多的，便是邵力子先生主编的《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栏内发表的论文。因此，那时《觉悟》成了我最熟悉的朋友，给我的影响也最大。

一九二二年春节后，我母亲找我三舅商谈，解除了我和我表哥的旧式婚约。我很高兴。但正是这时，我三舅父却找岔子，在我母亲面前对我提出严厉的指责。这就惹恼了我，使我感到非常委屈，只得挺身而出，和他争辩，顶撞了他。我舅舅大发雷霆，在他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全家人的面前，也在我母亲的面前，对我大声叱骂。我自然不甘示弱，但我的声音不如他的宏亮。我怒气冲冲地对他说：“你想压服我不行，你对我们孤儿寡母已经欺侮得够了。我一定要在街上骂你，让常德全城都听见。”说完我就拿了一床铺盖离开他家（我和母亲原借住在他家，自理伙食），搬进我母亲负责的“文艺女校”。那时，正当寒假，学校里只剩一个看房子听门的老妈子。接着我果然写了一篇文章，揭露我三舅是豪绅恶霸，生活腐化，仗势欺人，满口仁义道德，实际是男盗女娼……。我把平时在《觉悟》等报刊杂志上读到的那些反封建、反豪绅文章中的字句，写进了我的文章。我把这篇文章拿到常德县出版的《民国日报》。当时我知道它比较进步，不是地方势力的报纸。但他们不愿登载。我和好友王剑虹，以一种小孩子的天真想法威胁他们，说我们即将去上海，我要把这篇文章投给上海的《民国日报》，还要告发他们，说

他们与豪绅勾结，压制青年，不肯登载这篇文章。……那时我想，至少上海的《民国日报》如邵力子先生等一定会支持我的。后来，总算他们登载了这篇文章，只是把我三舅的名字用了三个×××，而把我的名字用了三个□□□。我胜利了。因此我对上海的《民国日报》和它的主事者们就更尊重和佩服了。

很快我到了上海，进了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这个学校校舍简陋，学员不多，但老师都是在进步知识界名望很高的共产党人，如李达、陈独秀、沈雁冰、陈望道，还有邵力子先生等。我们，我和我的同学们，特别是我们几个从湖南来的好朋友们，真正感觉到是到了自由世界，享受着学术自由的空气；这些老师们每天都给我们以新鲜的知识。我们狼吞虎咽、生吞活剥地学得了一些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无政府主义，什么叫唯心主义，什么叫唯物主义等初步的社会科学常识。读书之余，我们特别喜爱学校给我们安排的一些社会活动。我们曾经背着竹筒沿街为罢工工人募捐，到浦东纱厂，向女工们讲演（实际我们的湖南口音、四川口音，那些女工都听不懂），参加庞人铨、黄爱（两个被湖南军阀杀害的爱国分子）的追悼会，参加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听李汉俊等人的讲演，还参加过朝鲜流亡国王的葬礼。这个国王叫李熙，因为受不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流亡出来，绝食而死的，遗有寡妻、独子。送葬的那天，那妻子坐一辆马车，我和剑虹等也坐了一辆马车。送葬的行列很长，其中有朝鲜人、有中国人。邵力子先生也走在送葬的行列里。一路上他都照顾着我们这些学生。这次我们的行动就是他安排的。我们原来对这位国王并不了解，但我们去了，也是表现我们对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反抗和对弱小民族的同情。这是一次极偶然地行动，但当时的情景，仍很清晰。现在记述这件往事，也是说明当时邵先生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对他的

学生们的关心，不只是限于教室里的攻读。

一九二三年，我到上海大学的文学系旁听。文学系的教员，大多是平民女校的那几位老师。但课程却有了变化。过去邵先生常向我们讲一般的思想问题，如反帝、反封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青年求学的态度，强调独立思考等等，而这时他教我们《书经》。《书经》的确是一本难懂的书，邵先生讲课文又是江浙口音，我们一时听不十分清楚。但同学们为了追求知识，而邵先生细致耐心，又很博学，讲解分析，力求浅显，我们听来，虽说吃力，也还是感到有趣味。

后来我到北京去了，离开了许多在上海的老熟人。廿年代末和卅年代初，我再回上海时，只同李达、施存统、陈望道、瞿秋白等有一点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我四处打听求援。陈望道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找邵力子先生帮助营救。我到了南京，找到国民政府的衙门，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待邵先生的接见。这间办公室挤满了等待接见的人们，看样子，他们都比我先来。我心里很凉，以为排不上号了，但很快就有一人走来请我进里间去。邵先生对我很自然，很亲切，还象过去一样。他非常惋惜地说：“这是怎么搞的？捲到这么一个大案子里去了！”他立刻写了一封信交我送给张群（当时的上海市长），他无限同情地叮嘱我：“即刻回上海，赶快把信交去。”我惶惑地接过他的信，感到他给我的一丝温暖，也感到前途的茫然。我匆匆赶回上海，但等不及把邵先生的信送出去，而也频却已经在龙华被杀害了。虽然邵先生的信件，没有能挽回这一场灾难，但我至今也仍然感谢他慨然给我的帮助。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望，我正在东北，听到我们与国民党举行和谈的消息，南京的和谈



子先生。邵力子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人民可靠的朋友。因此，我对和谈的成功，曾寄予希望。果然，在和平谈判中的种种事实，邵先生的言行表现，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和谈没有成功，但邵先生等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心祖国和平统一的恳切心情，和光明磊落的作为，是人所共知，人所共见，并永昭后世的。

近二十多年来，我与邵力子先生只有几次偶然在大会上见面，没有机缘再领受教益，但他为国家的统一，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幸福所付出的辛劳，都一直吸引我的注意，并深受我的敬佩。邵力子先生爱国爱民的坚贞意志和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爱憎分明、明辨是非的高尚情操，是足为万世楷模的。现在六届人大及六届政协第一次会议胜利结束，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行将出现崭新的局面。邵力子先生的一生言行主张，必将在海峡两岸引起新的怀念和影响。而我自己也勉励自己：“邵先生曾是我的老师，而且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将更加奋发有为，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工作。

1983. 6. 27

邵力子生平简史

傳 学 文

一、简 历

邵力子，原名闻泰，字仲辉，一八八二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县陶堰乡邵家楼。父亲邵霜，曾任江苏吴县县丞。一八九七年父死，邵住在江苏吴江县盛泽外祖父家。早年在私塾读书，一九〇三年二十一岁中举人，一九〇五年到上海震旦公学求学，一九〇六年转复旦公学，后又转南洋公学肄业。一九〇七年毕业后去日本学新闻学，同年与于右任等在日本创办《神州日报》，一九〇八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一九一〇年由于右任介绍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迫害，被驱逐出境。一九一二年为复旦公学复校，奔走上海、南京间。一九一三年在复旦公学任语文教师，兼任上海《民立报》编辑和《民声报》记者。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时，邵任该校副校长，并在校任课。经李大钊介绍，聘请邓中夏担任总务长，瞿秋白、蔡和森、陈望道、施复亮和一些社会进步人士担任教员。后来，于右任离开上海去广州，邵力子代理上海大学校长职，每星期要到学校开行政会议，并经常对学生发表演说，还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学生不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社会实际斗争，从而培养了大批进步分子和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一九一五年，他和叶楚伦创办《民国日报》，任主笔十年，并兼编《觉悟》副刊，同时又在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教书。那时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